

日本汉籍版本目录学

研究源流概述

梅 宪 华

中日两国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大批中国典籍传到了日本。对这批典籍的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学问——汉籍版本目录学。这门学问在日本早已存在,并且具有一定地位。从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以来,历代都有一批学者专治此学,名著颇多。现将日本各个历史时期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作一概略介绍,以飨读者。

一

根据史籍记载,早在公元三世纪时,中国典籍已传到日本。公元九世纪末,日本出现了全国性汉籍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尽管该目仅著录书名、卷数、撰人,内容分类也仿照了《隋书·经籍志》的分类体系,但它毕竟是在对当时现存汉籍经过一番从外在形式到内容特征的研究基础上,分类著录,汇编为书目的。因此,该书目的编纂,即意味着日本汉籍目录学的萌芽。

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年),是日本汉籍版本目录学形成的时代。从德川家康开始,幕府历代统治者对中国文化都积极提倡,采取起用儒者、搜求与刊行古籍、兴建文库收藏图书等一系列措施,这些都为当时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条件;兼之由于清朝考据学的影响,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风靡于日本学界,也直接促成了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形成。当时治版本目录

学者本身，几乎都是考证学者。

这段时期，首先由山井鼎（1690～1728年）著《七经孟子考文》，开创了汉籍版本研究之先河。山井鼎，字昆仑。曾受业于当时日本二位大儒伊藤东涯与荻生徂徕，1718年应西条侯之聘为儒员。时日本有足利学校，为著名之古书收藏处，山井请于西条侯，得允留校校书。埋首古籍凡三年，尽读其所藏。所获见珍本善籍甚多。而以当时通行之明汲古阁本校其异同，所校订者为《易》、《书》、《诗》、《左传》、《礼记》、《论语》、《孝经》，即所谓“七经”。又因《孟子》古不列为经，特分出，称《七经孟子考文》。全书于1726年完成。1728年，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闻山井著书之事，极为嘉许，而惜其未备，命儒臣物观校其所撰并为补遗。1730年书成献上，次年梓行。1732年，该书由德川吉宗命令输往中国，后被藏书家汪启淑收藏。“四库馆”开，汪氏献上，收入《四库全书》内。

《七经孟子考文》传入中国后，给予清朝学术以相当之影响。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将版本研究应用于学问上，是从《七经孟子考文》的输入才开始的。^①此说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阮元作《十三经校勘记》，此书实为其重要参考资料。另有人认为，清朝考据家卢文弨所校书籍多成于晚年，“其受山井书之刺激，殆所不免”。^②

继山井鼎之后，幕府时代许多考证学者，如吉田篁墩、狩谷掖斋、近藤正斋等，均致力于版本研究，因而使这门学问得以确立。

吉田篁墩，生于1745年，卒于1798年，为德川幕府时期著名汉学家、考证学之先驱。首倡考证学，并将这一新学风在日本学界传播。而其突出的贡献则在于版本考校。“平生好合古钞数本，比对校刊四子六经”，被誉为幕府时代崇奉唐宋古钞影本之嚆矢^③。

狩谷掖斋，生于1775年，卒于1835年，亦为幕府时代著名之汉学家、考证学者。早年研究律令，曾专门研究过《六典》、《唐律》及《太平御览》等有关唐代法律之著。后又进一步研究经书，兼及度量衡、货币等。而其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则是版本目录学研究，日本学界甚至推为幕府时代唯一的版本目录学家。^④ 20余岁时，即对吉田篁墩《活版经籍考》作了纠谬。为撰《〈日本国见在书目〉注证》，亲自影写了日本寺院旧藏古钞本，并与《隋志》、《唐志》对校。此外，还进行了大量的汉籍的校刊工作，包括《群书治要》、《帝范》、《臣轨》、《毛诗郑笺》、《古文考经孔氏传》、《周礼》等。其人又是当时著名之藏书家与版本鉴定家，“积年募求宋元旧板，罕觐奇书多归其搜架”、“凡宋刻之时代前后及所刻地，若宋末元初疑似不可甄别，一经其审定，而不能逃焉”。^⑤

近藤正斋，名守重，通称重藏，号正斋。生于1771年，卒于1829年。一生博学精详，著述丰富。1808年出任幕府红叶山文库书物奉行，在职11年，专门致力于版本研究，突出贡献在于开创了运用帝讳缺笔及刻工名鉴别古版。所著《正斋书籍考》被认为如同中国的《书林清话》，为了解古版本知识之较佳的入门书。^⑥

幕府时代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除版本考校外，还有汉籍目录学研究，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大量的各种类型汉籍书目的编制。如专科目录，有冈本况斋的《易类书目》1卷，《经籍目录》8卷，櫻井石门的《秦汉以上经籍考》等。类书、丛书目录，有一色时栋的《二酉洞》2卷；冈本况斋的《龙威秘书所收解题》等。引用书目，有冈本况斋的《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引用书目》1卷，《汉书注引用书目》一卷，《后汉书刘季二家引用书目》1卷，《三国志注引书目》10卷，《通鉴胡注引用书目》一卷，《世说注引用书目》1卷。

史志目录，有松平冠山的《元史艺文志》1卷。著作目录，有村濑石庵的《清人著书目》8卷。这些书目的编纂水平较高。仅以槇山精一所编，刊于1847年的《官版书籍解题略》为例。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不细分门目。由于“据诸家书目及史志、《四库全书》等构成次序”，因而“虽无门目，实如有之”。^⑦著录包括书名、卷数、册数、版本。解题内容包括作者生平、书籍内容特点、价值。而“举作者爵里事迹，详其人品学问之传统。此外，“四书五经小学之正文同通行本，人人皆知者，不作解题”。^⑧这种方法，显示了解题的灵活性，郑樵的“注泛无义”论在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第二，对我国古典目录学的研究。主要是对我国古代书目的研究，或补充不足，或考证内容。如松泽老泉的《汇刻书目外集》，系“哀古今丛书目录，排比整列”，并与清人顾修所编《汇刻书目》比对校勘、“补其遗漏，并是正其讹谬”，^⑨仿顾氏之体例而编。又如冈本况斋《四库全书总目异同一斑》，《崇文总目存疑》等亦属此类。此外还涉及对中国目录学发展源流的研究。松泽老泉所撰《经籍答问》，以答问形式讲述中国目录学产生与发展，即其一例。

总之，德川幕府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提倡，在清朝考据学风的影响下，本考证之精神，不少学者从版本目录学角度对汉籍进行研究，出现了一批名著，从而确立了这门学问。

二

1868年的“明治维新”，结束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日本进入了明治时代（1868～1912年），从此直到大正时代（1912～1925年），日本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已不再是其学习的对象，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大大降低。因而，汉籍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已不如德川幕府时代开展得那样广泛。但是，在有些方面

却继承前代而更有发展。在版本研究上,出现了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以及著名学者岛田翰。此外,出现了分类独特、著录齐全的高质量汉籍书目。

森立之,字立夫,号枳园。生于1807年,卒于1885年。以医学者而对中国典籍感兴趣,幕末根据狩谷掖斋传下之有关资料,编成《经籍访古志》,以后又不断修改。全书凡7卷,将幕府末期传存之宋元刊本、古写本、旧刊本、古活字印本等分四部加以解说,附以医书。所收主要为元以上之古本,如明清之本,“必审择其绝佳者载之”,^⑩故名《经籍访古志》。其体例依《天禄琳琅书目》、《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记内容包括各书之时代、序跋、行款、识语、印记、藏者等。该书既是“古版研究的入门”,又“可说是从狩谷掖斋时代到明治初年古版研究的总结”,^⑪尤其所收录中有不少为中国已佚之书,因而具有重要价值。此外,由于该书较完整地收录了幕府传存之宋元旧本,对于了解日本收藏中国古籍善本之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初,杨守敬访问日本时,调查珍本善籍即据该书而进行。

《经籍访古志》虽然为总结狩谷掖斋时代至明治初年日本汉籍版本研究状况之著,但是其主要反映的仍然是幕府时代后期版本研究的水平。谈及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汉籍版本研究,主要人物首推岛田翰。岛田翰,字彦桢。1829年生,卒于1915年。其父为当时著名之汉学者。受父亲影响,自幼即埋头于汉籍版本研究。21岁时,在汉学者竹添井井的指导下,从事于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宋元古版本及明代善本、日本古写本的调查。董康游日本时,与其交识,称其“博学强识”“于隋唐遗卷、宋元旧槧之源委,洞悉靡遗”。^⑫著有《古文旧书考》4卷,《群书点勘》16册及《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等。其中《群书点勘》系仿卢文弨《群书拾补》之体例,被董康赞为精博更超卢氏之著。^⑬《古文旧书考》则“专以参辨钞刻之源委、匡订旧志之谬传为体”,^⑭凡4

卷，曰旧钞本考、宋槧本考、旧刊本考、元明清韩刊本考，所考订书籍计50余种。并有“书册装潢考”、“雕版渊源考”二篇。前者专门考论中国古代书籍装潢制度之变化，其中主要考证简策制度，就简策长短之处，以《左传正义》、《论衡》等史籍记载，补充清人金鹗之考证，批评了段玉裁等所论之失误，肯定了“六经策皆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乃为尺二寸”；^⑮后者着重考论雕版之源起，通过引《颜氏家训》等记载，指出前人所谓“隋时始有佛书雕本，监本始于冯道”者，实误！事实上，雕版“昉于北齐以前，而唐太宗以前已有监刻本”。^⑯是书当年传至中国，俞樾读之，即叹其中“慎思明辨之功，为自来校勘家所莫能及矣”，^⑰直至今日，仍被日本学界奉为汉籍版本目录学名著。岛田的版本研究成就，除上述著作外，还在于与近藤正斋共同发现了古版鉴定的法则，即运用帝讳缺笔与刻工名鉴别版本。在这方面，近藤是开创者，岛田则是积极地应用者。他曾通过对刻工名的调查，明确了图书寮所藏《尚书正义》为南宋本，纠正了原定为北宋本的错误。正是由于有这些成就，因而日本学界推崇其为明治、大正时期最杰出的汉籍版本学家。

这一时期出现的高质量汉籍书目，可推大正年间池田四郎次郎所编《经解要目》。此目属举要书目，而从分类到著录都显示了较高水平。在分类上，按《四库全书总目》之“经部”分大类，并加“石经”、“诂经资料”2类。其“诂经资料”内分书目·解题、类书·丛书、辑佚、师承·沿革、门径、校勘、杂考、音义·训诂、集语、绘图、纬书各小类，其他各类则按古注、新注、旧注、新疏、新解、古学、全注以及杂考、评文、外书等细分之。在著录上，除有书名、卷数、撰者、版本外，又根据必要，时加注释，或述内容特点，或叙撰述原委，或记分类根据，或注读法等等。例如：

“易类·二·新注：周易传义二十四卷。五经集注本。程子

易传元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全解。此书取吕祖谦《周易系辞精义》所载程子解及遗书补之。”

此外，在著录上，为充分揭示经学研究之重要资料，又运用了互著、别裁之法。如《十三经注疏》、《五经大全》等所收各经分别见于所属类别之下。此外如《壁经辨正》（日本大田元贞撰）、《檀孟批点》（宋谢枋得批点）等亦采此法著录。

明治、大正时期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除上举之外，较著名者，还有和田维四郎《访书余录》。其人本为矿物学家，但在版本目录学研究上亦十分著名，甚至被称为“实践日本近代版本目录学的先觉者”。^⑧该书包括总说、旧钞本、古写经、古刊本、活字本等编，内容自汉字、汉文、书体、印刷、装裱直至中国传日之古钞旧刻等，均有专门论述，为这一时期“有关古籍研究之卓越著述”^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内藤湖南，其人虽为史学家，但对版本学也颇有研究，所著《宋元板之话》，论述了版本起源、版式区分、日本汉籍版本研究历史发展、特点等等，可视为日本汉籍版本研究理论总结性著作。

三

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日本学界出现了古物研究热，考古学、古史古文化研究逐渐兴起。受风气影响，版本目录学研究一时也十分兴盛，其标志即专门学会——日本书志学会的成立，以及专门刊物——《书志学》的问世。

日本书志学会成立于1931年12月。先是，版本目录学者有感于各人分散于各图书馆，局限于各自有限的藏书。为便利互相交流藏书，共同进行研究，推动版本目录学研究进一步开展，由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等人发起，在实业家兼藏书家安田善次郎私邸正式成立此组织。参加者包括藏书家高木利太、德富猪一郎等人以及收藏典籍的著名图书馆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

帝国图书馆、尊经阁文库、岩崎文库、静嘉堂文库、京都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专门研究人员共20余人。学会成立后，每月召开例会，探讨学术问题，组织会员参观重要藏本等。并致力珍本善籍的影刊、重刊，召开善本展览会。先后刊行的贵重书籍包括《善本影谱》、《旧刊影谱》、《宋本书影》、《影宋刊本御注〈孝经〉》、《影宋刊本〈三世相〉》、《影印本〈活版经籍考〉》、《十三经影谱》等。为便于研究，1933年又创刊了机关刊物——《书志学》。该刊主要内容包括日、汉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论文、随笔，学术界动向，学术专著评介，日、汉文学、文字学以及古籍研究论文，当年出版专业书刊目录等。刊物自创刊至1942年停刊止，发表了大量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重要论著，产生了极大影响。六十年代中期，重又复刊，数年一册，影响远不如以前。

日本书志学会的成立，推动了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开展，甚至在有关中国学的各个学科领域，如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都有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名著也时有发生。但是，作为专门系统从事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者并不多，其中最著名者，即长泽规矩也。

长泽规矩也，生于1902年，卒于1980年。192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30年完成东京大学大学院文学科硕士课程。历任法政大学讲师、名誉教授，爱知大学文学部、图书馆短期大学教授。1961年以《和汉书的印刷及其历史》获文学博士。1966年获紫绶褒章。1973年受勋三等。1980年因患肺炎逝世。

长泽的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包括汉籍版本研究和中国传统目录学研究。汉籍版本研究，又分断代研究和通论性研究。断代研究中，成就最著者是对宋本的鉴定、研究。自1933年《书志学》1卷1期开始，陆续发表了《关于插图宋刊本》、《宋朝私刻本考》、《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宋版鉴定法》、《十行本注

疏考》、《越刊八行本注疏考》等文，全面论述了宋刻本的地区、版式、种类特点，提出了运用刻工名、查验木记、字体、对照款式等鉴定方法，对前人认为的宋本作了考证，纠正错误的观点。尤其《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可以说是其宋本研究成果中最具价值者。该文根据日本静嘉堂等七处所藏130种宋本，收录刻工名1500余个，为鉴定宋本提供了基本依据。汉籍版本通论性研究，主要有《唐本版式的变迁》（《书志学》7卷3期）、《中国古今刻书地的变迁》（《书志学》15卷5期）等。前文主要针对内藤湖南按时代区分中国历代版本（即分为：自宋太祖至神宗为一期，哲宗至光宗为二期，宁宗至明宣宗为三期。见其著《宋元板之话》）的分期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由于各出版地都有不同特点，因此区分版式特征应按空间而不是时间，并就匡郭、版心、鱼尾、书耳、卷头、木记及字体的时代、地区特点作了全面论述。

长泽的中国传统目录学研究，包括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研究。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发展至《四库全书总目》，为最详确。然而近代以来，新学新著不断出现，四部分类也必须加以改革，才能适应时代要求。就此问题，长泽发表了《汉籍集部分类表》（《书志学》13卷1期）、《汉籍分类答问》（《书志学》13卷2期）等文，全面提出了改革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思想，通过在各部设置新门类、调整旧有门类，将新学新著均纳入四部分类中，并且，通过设置“附录”的办法，较妥当地解决了一部分难以归类之著作的归类。

（二）对汉籍目录著录方法的研究。历史上曾有大量汉籍输往日本，保存于日本各大图书馆中。为这些汉籍编制目录，是今天日本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由于汉籍本身所具有的种种特点，为目录著录带来了困难。为使编制汉籍目录的人员掌握基本的著录方法，长泽撰《图解古书目录法》（汲古书院1973年出版）、《汉籍整理法》（汲古书院1974年出版）二书，根据自己的经

验，讲述了汉籍书名、著者、出版事项、卷册数等的记录方法。认为，目录应尽量避免主观，但为使记载项目更详确，有必要加以实物中没有而由编目者的经验所得出的事项；著录各书的方法应统一，应确立目录法。二书可以说对编目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为汉籍撰写解题。解题作为揭示图书内容的重要方法，在我国古代编纂书目时，已被广泛运用，可以说是我国古典目录学之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近代曾被抛弃，而长泽却很好的利用了。在其学术生涯中，撰写解题为深受重视之一项工作，所作解题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其中学术价值最著者即《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文求堂书店1940年出版）。该书将中国版本目录学之著按史志、方志、官藏、图书馆、学校、家藏劝学、读书题跋、专科目、著述目、版刻、禁毁目、征访私刻、丛书目、引书目、图书学、丛刻、杂书等分类，以解题方式，对各书之内容特点、著录方法、学术价值及作者等介绍评价，并述书籍之聚散，从而使读者不仅对中国历代各种版本目录学书籍有一较概括了解，而且也可了解中国古典书目的分类沿革以及历代各家藏书源流与特点。以此形式介绍书目、讲述中国版本目录学史的著作，中国也较罕见，因而也更能说明此书之价值。

进入昭和时期的日本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以长泽的研究最为系统、广泛而专门。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对中国传统目录学进行了研究。例如仓石武四郎著《目录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3年刊），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性质作了探讨，指出了中国古典目录学与校雠学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中国古典目录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不能把目录学仅看作是校订字句也不能说校仇之外别无目录。校雠学重视的是考定文字的异同，以确定正确的定本；目录学则重视类别书籍，以编制目录，但编制目录又必须考定内容。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重要书目、书目分类法等

作了研究，或是从思想文化角度揭示书目的意义，或是通过考证，批评前人观点，重新揭示书目的价值，或是结合社会政治、思想、学术背景分析中国古典书目分类法。如金谷治《〈汉书·艺文志〉的意义——作为体系化的哲学著作》（《东北大学文学会《文化》20卷6期）、山内巳博《〈文献通考·经籍考〉和陈氏〈直斋书录解題〉——〈四库全书总目〉批判序说》（《史学杂志》75卷9期）、仓田淳之助《四部分类的传统》（《东洋史研究》8卷3期）、井坂清信《中国的图书分类法——从二刘到〈隋志〉》（《东洋史研究》8卷3期）等等。总之，除专职研究者系统全面的研究外，此类研究为数亦不少。

这一时期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又一重要方面是汉籍目录的编制。各文库、图书馆在这时期编制了一批本馆汉籍藏书目录。此外一些研究机构也编制了汉籍书目，甚至为编制汉籍目录还专门建立机构。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9年成立的“汉籍委员会”，就是专为整理汉籍、编制目录而成立的。因而，这一时期汉籍目录编制特点之一，是多为集体、有组织地进行。另外，这一时期汉籍目录编制另一特点是收录齐全、著录完善，质量较前更有提高。如《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选汉籍中秘藏稀覯之书共792种，按四部分类，凡3卷，另附大藏经目录1卷。每书著录书名、卷册数、作者、版本、序跋，并一一列举书中阙卷。对古刻旧钞之佳者，并记书法行款格式，揭先贤题识，校仇年月，鉴藏印记，使详其来历。该目堪称书目中之佳者。此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也以编制质量之高为书目中之上乘。

四

日本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是在积极借鉴清代考证学方法、

吸取中国传统目录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从德川幕府时代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日本的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成果累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其一，更为讲求“实事求是”的考证学风。治版本目录学者，皆本考证之精神，考据之方法而从事这项工作。在版本研究上，讲求亲自调查、接触实物，排比校勘版本。通过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长年的经验积累，才产生有效的古版鉴定法。长泽规矩也的运用刻工名鉴定宋本的方法，是通过静嘉堂等七处所藏130种宋本调查，收录1500余刻工名而得出。岛田翰在版本研究、鉴定上的杰出贡献，其基础也是建立在大量调查了宫内省图书寮等处宋元古版、明代善本和日本古写本之上。内藤湖南认为，日本的版本研究较之中国更为先进，版本鉴定方法的运用上超过了中国。^{②①}确实，日本学者总结与完善了一些版本鉴定的方法，并且，也纠正了不少中国前辈学者在版本研究中所提出的错误观点。

其二，理论与实践工作密切结合，重视汉籍书目编制。日本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本身包括了汉籍版本研究、中国传统目录学理论研究和编制汉籍书目等方面。自德川幕府时代以来，历代学者研究汉籍版本目录学，相当重要的工作是编制汉籍书目，因而历代都产生了大量的各种类型汉籍目录。尤其现、当代，日本各文库、图书馆及一些研究机构把编制汉籍目录作为自己的学术任务来完成，编制了一批收录较全、著录完善的大型、高质量汉籍目录。还有一些学者，甚至在其研究生涯中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是专门研究编制汉籍目录的技术方法。如长泽规矩也，曾先后撰写了《和汉古书分类法》、《图解古书目录法》、《汉籍整理法》等著作，专门讨论汉籍目录编制上的一系列问题。这种现象，反映出日本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不仅探讨理论，也更重视书目编制的实践工作。其所编制的一些较著名的

书目，如《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以及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等，著录上独具特色，不仅记书名、卷册数、撰者等一般项目，且往往详录版式、书法、行格、印记、题识等等，有的还详录刻工名。

其三，积极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目录学之优长。日本的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继承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使其在不少方面达到甚至超出中国的研究。例如，在版本鉴定上，吸收了中国前辈学者提出的利用字体版式、题记以及缺笔、刻工名等鉴定古版的方法，进一步加以完善，并利用这些方法，结合其收藏有众多汉籍古钞旧刻的有利条件，对前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加以纠谬、补遗。在书目编制上，不仅详尽设立项目，还尽可能完整地反映原书外貌，且灵活运用“解题”方法，插示原书内容及其他方面的特点，使书目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参考价值。

日本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极吸取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并将其融合进本民族文化之中，从而创造出许多优秀成果，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即其中之一方面。今天，我国在这一领域里的研究欲求进一步发展，日本的研究成果当有可资借鉴之处，这也正是本文撰写目的所在。

附记：本文撰写过程中，因客观条件所限，一些资料未能查得，一些问题也不甚明确，为此专门去信求教于日本庆应大学汉籍研究专家尾崎康教授。承蒙尾崎先生帮助，寄来了有关资料，并解答了问题。在此谨致谢忱。

注：

①内藤湖南《宋元板之话》见其著《东洋文化史研究》弘文堂书房

1936年出版

②梁盛志《山井鼎与〈七经孟子考文〉》见其著《汉学东渐丛考》
中国留日同学会1944年出版

③中山久四郎《考证学概说》见德川公继宗70年祝贺纪念会编《近世日本的儒学》岩波书店1939年出版

④川濑一马《狩谷拔斋的学绩》见《书志学》4卷6期 1935年6月

⑤森铎三《掖翁杂记》见《书志学》4卷6期

⑥内藤湖南《宋元板之话》

⑦⑧《官版书籍解题略》“凡例”

⑨《汇刻书目外集》“自叙”

⑩《经籍访古志》“序”

⑪《宋元板之话》

⑫⑬董康《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识”

⑭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序”

⑮岛田翰《书册装潢考》见《古文旧书考》卷一

⑯岛田翰《雕版渊源考》见《古文旧书考》卷二

⑰俞樾《古文旧书考》“后记”

⑱《大百科事典》“和田维四郎”条 平凡社1984年出版

⑲《大日本百科事典》“和田维四郎”条 小学馆1980年出版

⑳《宋元板之话》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图书档案系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